中国海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出版基金资助
中国海洋大学文科发展基金项目

叙事中国

——文化研究视野中的王安忆小说

马春花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青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叙事中国：文化研究视野中的王安忆小说/马春花著.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10
（面朝大海博士文库）
ISBN 978-7-81125-088-6

Ⅰ.叙… Ⅱ.马… Ⅲ.王安忆－小说－文学研究 Ⅳ.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6274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网　　址 http://www2.ouc.edu.cn/cbs
电子信箱 mazh816@163.com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传真)
责任编辑 马召辉　　**电　　话** 0532－85902342
印　　制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 mm×230 mm
印　　张 14.125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前言　作为寓言的王安忆小说

关于王安忆，我们知道些什么？我们知道的，她自己都说过，在小说中，在散文中，在访谈中，在形形色色的文字中。关于小说，关于女人，关于上海，关于中国，或者还有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一一被编织成语言的光线，折射在她的言谈和虚构里。我们洗耳恭听，然后记录下来，就是王安忆的寓言中国：一个在现代性神话里荒芜的废墟。寓言在语言之中，一如废墟在城市之中，寓言是语言的铭文，而废墟是城市的本质。王安忆对于现代中国的纪实、虚构与想象，就是对一个废墟的纪实、虚构与想象。《长恨歌》是一个肉身成长为废墟的悲歌，《遍地枭雄》是辗转于遍地废墟的枭雄，而《桃之夭夭》则是绽开于古典废墟里的塑料花。至于新近的《启蒙时代》，却是对一个记忆废墟的重塑，那个成长的男孩，恍惚就是百年中国的现代性寓言，一个现代性的主体植根于“启蒙神话”循环的历史废墟之上，既映照着象征秩序的训诫又交叉着个体的反抗，是一个时代的历史、政治、文化无意识的缩影。在王安忆的小说中，那种曾经存在但尚未显现的经验与当下意识共同进入一种“结构”，一种历史的、辩证的图景，回忆、虚构和想象形成一种清醒的话语形式——寓言：“从思想观念的角度重新讲或者再写一个故事。”[①]上海传奇《长恨歌》的根底里却与上海无关，是“写脆弱的布尔乔亚和壮大的无产阶级”[②]；寻根小说《小鲍庄》道尽废墟，是一个现代中国的前世

①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18 页。

② 王安忆、张旭东：《理论与实践：文学如何呈现历史》，《文艺研究》2005(2)。

今生;《遍地枭雄》中几个枭雄流窜江湖,是无产者在一个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游戏;而更早的《本次列车终点》,则是永远处在变动中的中国现代性进程。王安忆小说何曾囿于现象的牢笼,从来都是寓无限于有限的寓言世界!

一个女人的故事,一次出走的历险,一次启蒙的完成,这些都并不在故事本身,其隐在的意义指向别处。"它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把握自身的体验并将它成形,意味着把握广阔的真实图景,并持续不断猜解存在的意义之谜,最终在一个虚构的结构里重建人的自我形象,恢复异质、被隔绝的事物之间的联系。"[①]从此在意识远方,于现实洞察过往将来,在日常生活的结构里把握具体时空的历史复杂性,把个体的欲望叙事连接在**H**　的政治与文化氛围中构成个体的那种实际和潜在的社会关系上,于是一个女人,一个故事,一个人生,一一成为辐射出整个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寓言结构。这些寓言横跨于革命中国与后革命中国的裂谷之间,既有对屹立不倒的"资本主义文明神话"的揶揄和批判,也有对失败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想象"的怀旧与感伤,王安忆的"中国寓言"是交映于神话与乌托邦废墟里的无名镜像。伫立于两个神话的中间地带,王安忆最终成为这个世界的局外人,因为她比任何人都深刻地介入到这个时代的潜意识,并洞察到隐藏其中的彼此交织的真相和假象,并将它们用一种世俗的语言表述出来。其实,王安忆小说的寓言性在于用枝蔓缠绕的世俗话语编织这个世界的表象,而在自然化、物质化的语言形象的空白处连接着沉默的现实——阶级关系、象征秩序、商品机制、精神分裂以及历史强迫症。我们因此可以理解王安忆为何总是迷恋于繁缛的细节而不能解脱,为何总沉醉于革命时代的怀旧而欲罢不能,为何总在本文中间隐藏难以释怀的旧日乡愁。细节、怀旧和乡愁带来腐朽、衰败、感伤、没落的格调,那是一个常态的文化空间被现代性冲击、打断并取代后,陷入时间性的忧郁中而产生的美学意识,它们支配了王安忆对于中国的理解、虚构和想象:一个消逝的过去是现实的无

① 张旭东:《本雅明的意义》,《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北京: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17 页。

意识世界。

寓言往往是集体经验和集体意识的反映，即使是有关个人潜意识世界的叙事，也往往带有阶级、族群以及性别的意识形态属性。王安忆极少提及自己写作的个人性、内在性与独特性，反而乐意在一个族群的认同中确立自己的写作立场，尤其推重自己的本土性身份，她更愿意认同自己是“中国作家”、“人民作家”、“共和国之女”、“第三世界女性作家”的家国身份。在一个所谓全球化的文化体系中，突出自己的国族身份是一种很“另类”的选择，不过倒显示了作为一个“民族寓言”书写者的地缘性自觉。但是王安忆的中国寓言并非是某种一以贯之的民族寓言形式，反而显示某种断续性、分裂性和异质性，具有一种复杂而矛盾的不确定性，处于不停地演变和蜕变之中。我们有理由认为，王安忆的寓言中国一方面与王安忆作为一个个体主体的生成历史有关，她为“一代人”刻写了漂流于两个时代的墓志铭，在告别革命的同时又怀恋着那个“青春万岁”的“启蒙时代”，前期社会主义中国造成了他们个体认同的潜意识世界；另一方面，这个民族寓言又与现代中国宏大的现代性历程联系起来，反映了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精神创伤和历史无意识。当一个在前期社会主义时代被否认的历史经验在新时期重新成长为新的现实的时候，被撕裂的震惊性体验通过一种寓言的方式被传达出来，并呈现出某种挣扎、反思和斗争的姿态。“共和国之子”的身份强调是一种历史态度和价值立场的确认。“启蒙时代”的“长恨歌”或者就是“69 届初中生”的寓言中国：它既是当下中国的现实矛盾在审美层面的形式性解决，象征了一种中产阶级的“普遍主义”的美学风格的确立；同时又表明了一种颠覆的声音，在怀旧的布尔乔亚风格下面是对于这个世界的绝望反抗；或者它只是对后革命中国的生产方式的某种模拟，如果寓言是一种对于“虚伪”的中国想象的反拨，那么它最终导致的是一种自陷式的自由叙事，在对这个世界的时空特性的寓言式把握的同时，其实已经成为它的“永恒秩序”的一部分。

作为“民族寓言”的王安忆小说的美学价值在于它意蕴的含混与隐晦，这是一个与现实中国同构的意义形式。当代中国的世俗化过程是一个从一元到多元，从整体到碎片，从人民到大众——的社会及其想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撕裂的过程，对能指的一维指认滑落到多维的历史镜城，折射出幻化万千的镜像，一切皆成雾中风景，影影绰绰。阐释王安忆的“民族寓言”因此也必然从多元的视点立体切入，从而获得与文本本体的寓言性相对应的解释，而以文化研究作为立论的方法，从王安忆的身份构成、性别意识和空间政治等角度出发，也许可以获得认识并理解王安忆小说的别样可能。

序

1998年的秋季的某一天，我简陋的宿舍里进来了一男一女两位年轻人，那时我还住在山东师大的一间狭小的筒子楼里，起居十分局促，书籍和生活用具堆在一起，乱作一团，每每来客都十分狼狈。但进来的两位客人却似乎并不介意，神闲气定地坐在小马扎上，对我说，我们被分给你做学生了。

这是我第一次以独立指导学生的身份带研究生，其中的这位女生就是马春花。谢天谢地，我的运气好，虽然没有参加分学生的见面会，但被分配给的两位学生竟是这届研究生中最优秀的。马春花后来一直被誉为“才女”，在读期间就在《小说评论》等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她不但表现了敏锐的问题意识，对文本的出色感悟力，还显示了初步的理论兴趣与构建能力，文字也好，新鲜而富有锐气。后来她的硕士论文《中国当代女性叙事与女性意识的递变》，还获得了“山东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的奖励，让我也跟着沾光得了一回奖金。本来，2001年马春花硕士毕业那一年，曾投考中国社会科学院陈晓明研究员的博士，成绩也已经够线，但因为她贪图在青岛找了一份工作，另外还有家庭原因等等，又放弃了此次读博士的机会，我曾深以为憾。但随后在2003年，她又重新考回了山东师大，师从著名学者朱德发先生攻读博士。朱先生亦曾是我的硕士导师，对马春花的基础与才情也甚为欣赏，曾多次与我谈及对她学业和前景的设想。朱先生乃名师，指导有方，小马遂有突飞猛进、蜕茧化蝶之变。2006年夏，她的博士论文答辩我也参加了，果然她又有一番出色表现，答辩成绩优秀，获得了诸位答辩委员的首肯。

如今，短短一年过去，马春花又拿出了她的另一部书稿，这本《叙事中国——文化视野中的王安忆小说》。起初我有点不以为然，因为关于

王安忆的研究实在太多了，据说在现今当代文学的“学术生产”中，以王安忆为研究对象的文字是最多的，其中大多数文字又同当今的经济生产一样，是在做“低水平重复”，或用比较专业的说法，叫做“话语复制”。但我翻读小马的书稿，却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首先是她的文化研究的视角，超越了一般的女性主义理论所衍生出来的一种概念化理解，更加综合和开阔，理论支持更为坚实和宽广；其次，对于作家的研究也超越了一般的性别视角，而将之放在当代中国曲折多变的历史框架之中，使之成为代际、性别、地域文化的综合符号，成为涵义丰富的文化载体，然后对其作出种种深入和系统的新解读，使王安忆研究这一命题有效地扩展为了一个重大的文化研究课题，拓展出一个广大的学术空间；三是文本分析更有新意，她首先将王安忆的大量的创作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使之成为彼此关联、烘托、彰显和依存的话题，然后再对之进行细读分析，这样便一下子扩展了作品的意义，使具体而孤立的文本与形象变成了连环和系列的文化图景，成为她所诠释和阐解的“中国寓言”的有效载体；最后是语言，如今读小马的文字，已觉有几分老练和诗意，感到了其化繁为简、还概念以形象的追求，这是最令人惊喜的。如今学术生产的弊端之一，便是话语的复制、概念的自我遮蔽、表面的专业化和学术化，使语言活力尽失，表述过程令人厌倦和窒息，而小马的语言则灵动而准确，感性而富有学术内涵，很有情致和神韵。学术文字能够如此，表明她确实已接近一个成熟的学者了。

关于王安忆研究本身，我也许无资格置喙，因为我对她的研读并不深入系统。但我以为她的重要，确实在于她的综合，她的自觉的历史、性别、地域与文化意识，她身份认同的多重与复合性。如果一个当代中国的作家不能忠实并执著于自己的历史遭际与精神记忆，那么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对于一个好的研究者来说也同样如此，如果他或她不能从一个作家身上发现一个时代的秘密，不能从她身上解释出一段历史的渊源与奥妙，那么这种研究究竟又有什么意义呢？从这点看，马春花是一个聪明的、一个合格的研究者，她以亲近历史和深入当代文化的自觉，以文本结构的隐秘通道，而接近并重新“发现”了王安忆，分析出她作品中的历史与政治、性别与自我、地域与日常生活，并且

以此构成了她这部书的三个主要章节。应该说，这个构架几乎没有什么遗漏，她呈现了一个完整的和立体的王安忆，一个感性和鲜活的王安忆，一个复杂而透明的王安忆。

“文化研究”被认为是一种当代学术的显学，它打破了任何单一学科的疆界与樊篱，将学科内的学术研究，变成一种社会科学空间的广阔的公共学术话语，大大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几年中，小马靠她的刻苦学习，在这一行当中俨然已成为一个得心应手的内行。从方法的角度讲，我不但欣赏这部书本身，更为小马所取得的长足进步而感到由衷的欣喜，她已经打开并进入了自己的一个广阔的学术空间。我相信，假以时日，她还将取得更多和更大的成就。

此刻我想起了海德格尔在他的《艺术作品的本源与物性》中意味深长的一句箴言，“作品使大地成为大地”。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人类在大地上诗意的创造与栖居，大地将一片荒凉，如果没有希腊的神殿巍峨屹立在这个星球上，那么它将没有半点神性和诗意可言。从这个意义上，艺术家用自己的艺术创作，和众神一起确立了人类的文明，确立了大地这一万物之基。那么进而言之，优秀的艺术家用自己的作品也确立了一个个存在，他们所确立的一个个文化符号，将成为这个世界的物质存在的生动外壳。“使上海成为上海”——我或许可以这样来概括王安忆的价值，如果没有她的叙述，没有她的《富萍》、《长恨歌》、《桃之夭夭》、《遍地枭雄》，“二十世纪的上海”，风雨轮回、沧海桑田的上海在哪里？何以成为一个生动可感的讲述？所以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作家而言，一个优秀的学者，就是要通过自己的有效的阐释，将她的这些意义解读出来并确立下来。“使王安忆成为王安忆”，这个使命在这本书中，至少有了部分的实现。

我当然不能说这本书没有局限，夸自己的学生也无异于一种变相的“自夸”，我得说，它也许过于“像”一个“文化研究”的题目了，理论的分解有时候被不自然地纳入了固有的轨道，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表演”兼“捆绑”的性质，这是如今文化研究的通弊，自然不是小马自己的问题。她的敏感的文本嗅觉与艺术悟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矫正了这种理论的弊病，但仍然不能完全将之化解于无形之中，这应当是她在今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努力方向之一。唯有将工具化解于无形之中，才能真正展示自己的思想见解于有形之间。

拉杂说了这么多，以表对小马的祝贺之意。2005 年初，我从山东远迁京城，其间经历了一个很大的环境之变，每每忆起故人和昔日的师友与学生，都不免生出些许感慨叹息，憋不住要多啰嗦几句。而且我闻知，小马虽然还有另一本更具学术含量的著作，即她的博士论文也将问世，但这仍然是她要出版的第一本著作——经她提醒，我也猛然知晓这是我这些年来的学生所出版的“第一本”学术著作，于是便有了一份格外的兴奋和激动，比自己出了一本书还要高兴。

张清华

2007 年仲秋于北京师范大学

第一章　王安忆的身份政治与小说世界

第一节　自我塑造:身份政治和王安忆小说的变与常

王安忆是一个勤奋而多产的作家,也是一个不停前行的作家。她总在变,变得让评论者,特别是那些追踪研究的评论者无法对其加以归纳总结。在《论王安忆》中,汪政、晓华在回顾了她的小说艺术之路,把她的创作分成六个阶段后这样说:"我们深深感到,对王安忆这样的作家,要对其二十年的创作进行总体性的评论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她的变化实在太大。"[①]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评论者已经有这样的感觉了,那时程德培就说:"由于她富于变化的多产,致使对其创作的描述与概括,多免不了马不停蹄式的浮光掠影。"[②]对王安忆的变化,评论者其实是已经达成了共识。这也难怪,创作30年,从起点到现在,你几乎认不出原来那个她了。初涉文坛,她写了好多关于儿童的故事,也发表在儿童文学的杂志上,因此被看成是儿童文学作家。然后,她写一个类似她的女孩子"雯雯",甚至形成了一个系列,从20世纪80年代延续到90年代后期,《一个少女的烦恼》、《雨,沙沙沙》、《六九届初

① 汪政、晓华:《论王安忆》,《钟山》2000(4)。

② 程德培:《面对"自己"的角逐》,《当代作家评论》1987(2)。

中生》、《忧伤年代》等都是。可是她很快由自己走向他人，她写的《庸常之辈》、《本次列车终点》、《墙基》、《尾声》、《舞台小世界》等，有人又把她称为知青文学作家。其后，她又重回写“雯雯”系列时所用的那种对主观情绪的渲染上，她写“三恋”，写《岗上的世纪》，被人称其为写“性”的作家。之后，她不写城市，她写农村，写传统文化，在有了《小鲍庄》、《大刘庄》等，她又成了寻根文学作家。之后，她写的《弟兄们》、《逐鹿中街》、《叔叔的故事》，或者叙写女子情谊的生成与破裂，或者演绎性别间的硝烟，或者解构男性知识分子的启蒙神话，她又被当仁不让地认为是女性作家。《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或虚构母系家族神话，或虚构父系家族神话，她似乎又“跟”了一次家族小说的“风”。《香港的情与爱》、《长恨歌》，她又以情与爱来为城市造像，既有点新历史小说的味道，也有点新市民小说的意思，但是又都说不上。90 年代中期以后，王安忆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几乎每两年就推出一部分量颇重的长篇小说，《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遍地枭雄》、《启蒙时代》，篇篇别具一格，篇篇都是鸿篇巨制（我说的不仅是结构，还有作者写作的野心，一个全球化格局中的中国图景是愈来愈清晰了），篇篇也都出人意料。此外，还有密匝匝分布于文学期刊上的短篇。因此，王安忆越来越被大家认同为是能够进入文学史的作家，将会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她制造了新时期小说写作的矛盾现象，她确实是文学潮流中的人，但确实又无法归结于任何一个潮流，她的写作确实表现出边缘与另类的特点，但她确实又时时成为焦点，在文学已经真的失去轰动效应和整体性的时候，她依然是焦点。大浪淘沙，她是留在沙滩上最绚烂多姿的贝壳。但是，对这样一个创作颇丰、影响巨大而且会愈来愈大的作家的研究却往往仅止于单篇作品或者某一个阶段或者某一方面的特点的局部性研究，对其进行整体性的全程研究的论文则少之又少。因为人们不知道用什么来统括王安忆的创作，于是，只能用变化来指认她：“从总体上看，这种变化甚至是戏剧性的。”①

① 周新民、王安忆：《好的故事本身就是好的形式——王安忆访谈》，《小说评论》2003(3)。

但王安忆却多次对此表示遗憾与失望，她说："我觉得我的作品是随着自己的成长而逐渐成熟，如果说有变化，那就是逐渐长大逐渐成熟。我并没有评论家说的那样戏剧性的转变。变化全都是不自觉的，也不是清醒的。……事实上，一个作家，只要他是一个上进的作家，如果想把作品写好的话，他就必然有所变化。"[①]王安忆承认的变化是一种应和着自然万物生长节奏的变化，是自然的延伸和扩展，而不是"突变"、"戏剧性"地找不到内在联系的变化。作家与批评家对创作者认识的不同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过，对"王安忆研究"来说，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切入更能统合其整体的创作趋向，的确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而她自身的认识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作品随个人的成长而逐步成熟，个人的成长其实就是一个身份认同与身份塑造的过程，那么我们不妨从"身份"这个角度切入王安忆的小说研究中，"身份"政治赋予王安忆小说别样的面貌，也使王安忆小说在不同的阶段有一些不同的表现方式。因为，"身份"并非是固定的，一经形成，就不可更改。哈贝马斯提出，身份不是给定的，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的设计，身份内含着选择性。因此，"与其说一个人的身份是一个人所是，不如说是一个人希望的样子"[②]。身份也是一种塑造的结果，斯图亚特·霍尔说：

> 在第二个意义上，文化身份既是"变成"，也是"是"，既属于未来也属于过去。它不是某个已经存在的，超越地域、时间、历史和文化的东西。文化身份来自某个地区，有自己的历史。不过像一切历史性事物一样，它们经历着不断的变化。远非永远固定于某个本质化了的过去，它们服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游戏"。远非建立在对过去的单纯的"恢复"上，认为过去就在那里等着被发现，而且如果发现了，就能确保我们的自我感觉永远不变，相反，身份是我们对我们被定位的不同方式的称呼，我们通过对过去的叙述来使自己定位并

① 周新民、王安忆：《好的故事本身就是好的形式——王安忆访谈》，《小说评论》2003(3)。

② 哈贝马斯：《新历史主义的局限》，《自治与团结》，伦敦：弗叟 1992 年版，第 240 页。

定位于其中。[①]

这是对身份和文化身份的一种历史主义的理解，它赋予身份和文化身份流动多解的特点，但是坚持这种身份的历史观也是不够的，“身份”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着一些比较固定的属性，“某种集合性的‘真正自我’，隐藏在许多其他更表层的或人为的‘自我’之内”，[②]因此又有本质主义的文化身份观。两种文化身份观显示了其本身内在的矛盾，一般的看法是把两者统一起来，既承认身份的某些特质，但强调其多重性，把其“作为多种互不相容甚至互相对抗的文化结构（如种族、族裔、阶级、自然、性别、宗教、移民的原籍）的交叉点，表示的是某种多因素所决定的多重主体位置。在这样一个文化结构里，自我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它所占据的位置包含很多种地位。其中每一种地位又会由于同其他地位的交叉而产生某种微妙的变化”，[③]也强调身份的发展性、流动性和塑造性。

身份政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愈来愈成凸现趋势，因为通常在一个相对孤立、封闭和稳定的环境里，一般不会产生文化身份的问题。身份要成为问题，需要有个动荡和危机的时期，正如科伯纳·麦尔塞所说：“只有面临危机，身份才成为问题。那时一向认为固定不变、连贯稳定的东西被怀疑和不确定的经历取代。”[④]在中国作家中，很少有人像王安忆这样有强烈的身份感。一般“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会有强烈的身份焦虑，因为他们需要在另一个秩序里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女性作家会面临性别身份重新确认的问题，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意识形态对性别话语进行了重新塑造。90 年代以

①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散居在国外的人》，《身份、社团、文化、差异》，伦敦：劳伦斯与威莎特 1990 年版，第 225 页。

②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散居在国外的人》，《身份、社团、文化、差异》，伦敦：劳伦斯与威莎特 1990 年版，第 223 页。

③ 苏珊·弗里德曼：《超越女作家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431 页。

④ K·麦尔塞：《欢迎来到丛林：后现代政治中的身份与多样性》，《身份、社团、文化、差异》，伦敦：劳伦斯与威莎特 1990 年版，第 43 页。

后的作家在中国进入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背景中，往往会产生身份的焦虑。而王安忆正是这三者的混合。90 年代以后，王安忆在很多场合下纠正着、申明着自己的身份，“人民作家”、“共和国之女”、“第三世界女性作家”等身份认同既是一种已有的存在，也是一种自我的塑造，王安忆这种身份的有意识塑造必然反映在她的小说创作中，甚至成为识别其小说的一种铭文，女性的、“文革”一代的、“第三世界”等坐标轴的一个交叉点就是王安忆。但是，在具体的情境中，这些交叉的结构不可能同等重要，在艾里克森的模型中，身份的发展过程是通过发展的每一阶段的一系列特殊任务来完成的。其中，青少年时期是身份形成的关键时期。此时，他试图整合自己青少年时期的认同经验与社会对他的期待，来建立自己的社会身份以获得自己存在的证明。尔后，在个人生命的不同发展阶段里，身份的认同与发展也会表现出不同的面貌。身份内含着选择性，也是一种“变成”和自我塑造。表现在王安忆及其小说当中，则是其身份的不同侧面的不同程度的显现，通过这种显现，来“自我塑造”成为自己希望的样子。比如，80 年代是王安忆身份认同的形成期，她通过“雯雯”形象来确定自我的主体；90 年代，是王安忆的性别、国族身份的显像期；2000 年以后，主要则是阶级身份、国族身份的展现。但是某个情境中某种身份的凸现并不表明其余的身份就不存在了，“社会身份的其他坐标轴并没有消失，它们不过在这种特定的场合下，作用不那么明显罢了。”①

身份既是存在，也是表演；既有稳定的质素，又有不同的侧面。身份的这种矛盾性，构成一个作家创作的面貌，所谓的变与常，就是这个道理。

关于身份的建构往往是不稳定的，标签式的，它常会导致人们的抗拒，身份建构的作用是把它自身及其行为定义为样板，并因此排斥了很多定义自我、身体、欲望、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可能方式。身份是多重的、不稳定的又是规范性的，就像人的主体。主体并不是它自身或它的社

① 苏珊·弗里德曼：《超越女作家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434 页。

会世界独立的创造者。主体存在于社会关系的复杂网络之中。这些社会关系决定了哪些主体可以出现，以什么样的合法性出现。主体并不是先于政治或社会结构而存在的某种东西，而恰恰是在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并通过这种环境建构而成的。个人是特殊的社会和文化逻辑的结果。因此，福柯认为社会身份是知识构成方式的结果。人们可以让自己的身份现身，比如，王安忆承认自己是中国作家、共和国作家、人民作家，这种现身是一个自我揭秘的过程，内在隐含着认为这是一些正面的身份。但是在酷儿政治看来，现身并非一个揭示一个人的真实本性的过程，而是把它视为一种建构或者表演某种性身份的过程。① 人们也可以隐匿自己的身份，比如，王安忆对自己性别身份的隐藏或者替代，这既可以看做是对此身份的抗拒，也可以看成是对固定身份的抗拒。不管是现身揭秘也好，是隐藏不表达也罢，身份政治都是作家创作的内在隐秘与动机，通过考察作家的身份，可以更好地了解文本与作者、世界的关系，文学不仅是虚构，文学也呈现历史，文学如何呈现历史，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而不是那种方式呈现，与历史、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基于此，身份政治就是研究文本、作者与历史的一个很好的桥梁。

安泽多说："身份并不是一组分别置放智力、种族、形象、阶级、职业和性别的小房间。身份在一个人的各个侧面之间流动。身份是一条河——是一个过程。"②安泽多的"过程说"跟王安忆自我的表述异曲同工。下面，将专节讨论王安忆的身份政治与小说面貌之间的关系。代际、性别、还有阶级，虽各有重点，但其实也是多有交叉，侧重点不同。从身份政治来看王安忆小说，那就是一个"四五一代"的女性作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现代性进程的想象与虚构。

① 参见[美]葛尔·罗宾等：《酷儿理论：西方 90 年代性思潮》，李银河译，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Cloria Anzaldua，"To(o)Queer the Writer：Loca，escrita y chicana"，Inversions：Writing by Dykes，Queers and Lesbians，ed. Betsy Warland，Vancouver：Press Gang，1991，p251。

第二节 “四五一代”:王安忆小说的代际意识

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代际研究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通过代群,可以更好地研究复杂的社会关系,并将文化看做是非同质的。此外,与生命周期研究方法不同,代际研究突出了暂时性和历史的变迁,并且认识到在特定时期成长起来的代际造就了改变意义的明显差别。中国对于代际的划分和研究,还源于一种进化论的惶恐,这也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性焦虑症。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现代性焦虑从未缓解。“文革”的终结使国人的世界革命中心的幻觉消失,中国重返世俗世界,现代性焦虑变为双重,一个是急于告别历史的焦虑,一个是追赶西方现代化的焦虑,告别和追赶的意愿如此强烈,最终反映在代际的制造与命名上。像文学中的“归来的诗人”、“知青作家”、“晚生代”、“七〇年代”、“八〇后”等关于代的命名,以及电影中的“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的称谓等都可作如是观。对于文化精英来说,命名源于宏大叙事的渴望,他们从不匮乏制造神话的能力,并在造神中确立自我;对于政治权威来说,“乌托邦”的许诺瓦解后,现代化的突进也是自身合法性来源之一,短期的功利性目标似乎也有聚合大众的神效。貌似对立的双方合谋一道,以民族主义情绪为话语基础,以西方社会为历史参照,共建了激进的代际进化程式。因此,“代际”并非是一个单纯的社会群体的时间性归纳,而是一个具有众多意识形态内涵的政治身份。①

代际、女性代际与王安忆

国内较早地对代际问题做出社会学思考的是刘小枫。在《关于“四

① 参看韩琛博士论文《漂流的中国青春——中国先锋电影思潮论》,第161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